

疆界敘事與空間論述

boundary narrative *and* spatial discourse

張錦忠・熊婷惠（編）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NSYSU



離散／現代性研究室
Diaspora | Modernity

疆界敘事與空間論述

Boundary Narrative and Spatial Discourse

張錦忠與熊婷惠（編）

Edited by Tee Kim Tong and Hsiung Ting-hui

校對：葉倩廷

Proofreader: Yeh Chien-ting

2016年4月初版一刷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離散／現代性研究室

台灣·高雄市蓮海路70號

886-7-5252000#3241

<https://www.facebook.com/DiasporaModernity>

First published April 2016

by Unit of Diaspora/Modernity Research

and by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70 Lien-hai Road, Kaohsiung 80424

TAIWAN

本書版權所有©2016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論文版權所有©諸論文作者

封面影像版權所有©熊婷惠

All rights reserved

平裝 開本：158x224 1/25 印張：9

字數：170800 印數：1-300

本書在臺灣印刷

Printed and bound in Taiwan

新王牌彩色印刷承印

臺灣·高雄市807三民區安東街163號

886-7-3112250

ISBN 978-986-04-8280-5 (pbk)

CIP 資料見書末

目次

vii | 序 言／李有成

ix | 鳴 謝

01 | 張錦忠

緒論：此時此地——從離散論述到空間詩學

卷壹◎疆界與邊界

11 | 洪敏秀

移動的疆界：羅倫絲與陌異書寫

37 | 劉芳初

崔維新《紙影：唐人街的童年時光》的記憶與再現

55 | 熊婷惠

華語(語系)電影？：以邱金海之《伴我行》思考華語語系邊界

卷貳◎空間與身份

83 | 廖培真

南亞族群聚居區的認同政治：高泰姆·麥卡尼
《倫敦地下少年》中身份真實性和多元文化主義的爭議

109 | 張淑麗

超人神話、平民英雄與例外的例外：
麥可·謝朋的《卡瓦利與克雷的神奇冒險》

127 | 陳福仁

領養的個人敘事：母親的聲音

卷參◎地方與地方感性

153 | 李祁芳

倫敦人看世界 1598-1604：

《英國人是我的選擇》中之「地方」塑造

183 | 張錦忠

變易與交易：亞美詩人陳文平作品中的文化屬性與地方感性

203 | 高嘉謙

南溟、離散、地方感：楊雲史與使節漢詩

239 | 熊婷惠

編後話

241 | 論文作者簡介

245 | 索引

倫敦人看世界 1598-1604

《英國人是我的選擇》中之「地方」塑造

李祁芳

〈倫敦人看世界 1598-1604〉是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疆界敘事與空間論述》之子計畫，研究背景是伊麗莎白時期的英格蘭(1558-1603)，研究目的乃考究英格蘭／英國在國家轉型的關鍵時刻，倫敦人在因應政治、經濟、文化衝擊時，對於國家與地方不同面向的回應與反省。英格蘭在十六世紀下半葉大航海時代的政經史中，進入帝國主義與早期資本主義擴張、國家與城市意識興起的年代。在政治上，英格蘭必須面對歐洲國家複雜的政治競合，企圖在大國的夾縫中立足。在宗教上，英格蘭與羅馬天主教切割後，必須藉由奠定英王同時為英國國教與國家之領袖，來推動自身的宗教與政治自主性。在歷史上，英格蘭不斷反省自己在古典、中古時期的國家定位，開始以英文書寫英國史，並建立地方誌。在文化上，英格蘭因為面對強勢的歐洲文化傳統與語言，在審視自己的文化內涵時，亦開始建立以英格蘭為文化主體的國家特色與圖像。舉例來說，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 1551-1623)記載不列顛古代風俗制度的著作《大不列顛志》(*Britannia*, 1586)與《英國年鑑》(*Annales* 1597-)的問世、拉斐爾·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編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1586)的出版、莎士比亞戲劇中英國史的上演(1590-1603)、本土作家《喬叟全集》的出版與再版(1571, 1598, 1602)、克里斯托弗·薩克斯

頓(Christopher Saxton)與約翰·諾登(John Norden)英國地圖的發行(1579-)、甚至是平民史家約翰·史鐸(John Stow 1525-1605)《英史》(*Chronicles of Britain 1565-*)與《倫敦志》(*A Survey of London, 1598*)的問世，對於在印刷史上邁入知識機械化生產的英格蘭而言，都是在面對歐洲他者時，為了彰顯國家與地方所出版的指標性著作。

伊麗莎白執政的最後十年間，英格蘭在各文化層面也歷經急遽的變化與整合。倫敦人在企圖繪製自己的政治地圖時，從世界看到地方，從歐洲看到邊陲的自己。他們在思考歐洲大陸文明價值以及與強權競爭新世界資源之際，不斷檢討自身在世界版圖中的當代性與文化歸屬。在嘗試理解「世界」為何與成為帝國的條件之際，更是積極參與歐洲事務，將自己由小國轉型成泱泱大國，以開拓在新世界地區的貿易與殖民空間。這一五九八至一六〇四年間，英格蘭人在面對歐洲時，不斷思考所居住的世界，特別是關於我們和他們的議題，國家和城市的關係，以及海外帝國與小國崛起的必要性。也因此，在這六年當中，倫敦人與世界的關係，不斷地被賦予新定義。倫敦人這種敏銳的政治、文化自覺不僅反映在倫敦出版的官史與民史，也投射在文學戲劇作品中對自我與他者的建構與想像。

在此立體的歷史架構下，本論文試圖以歷史學的視野，從史料、地圖、地方誌、以及以城市空間為主題的城市喜劇著手，探討一五九八至一六〇四年倫敦人看世界的角度、對於「英國本位主義」(Englishness)的建構，以及對於「外來風」(foreignness)的抗拒、批判與吸收，希圖重構一個近代早期倫敦人閱讀國家／城市的歷史圖像。本篇論文的焦點是以移民為背景的新興文類「城市喜劇」，以威廉·霍頓(William Haughton)的作品《英國人是我的選擇》(*Englishmen for My Money, 1598*)為例，並以史鐸的《倫敦志》為該劇之戲劇地圖，來審視劇中的倫敦人、經濟移民與歸化者，在面對變動中的世界時，所產生的文化假設、抉擇與歸屬。本研究之學術貢獻乃提出新的文史深層論述，企圖建立一個城與界、本與異的對話橋樑，藉此透過英格蘭的崛起，來思考吾人在面為變動中的世界時所因應的挑戰。

壹、十六世紀之「變」與「動」：英格蘭面對歐洲帝國之競合

十六世紀初期的英格蘭在亨利八世在位期間(1509-1558)，在歐洲人眼中只是個位於歐洲邊陲之蕞爾島國，不僅政治弱勢、宗教反骨、無海上經貿條件、文化上更是毫無影響力。當亨利八世繼位時，全國人口不到三百萬，倫敦地區也只是個五萬人左右的小鎮(Wrigley and Schofield 26, 32)。軍事上，亨利七世只留給亨利八世十五艘船艦，也就是說，英格蘭在當時並非是個有正規海軍體制的海權國家(Childs 10-56; Moorhouse 105-19)。也因此，亨利八世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僅是保守地守住英格蘭的領土、防禦北方的蘇格蘭，並且收復在上世紀英法百年戰爭中所失去的法國領土。由於法國與蘇格蘭時常結盟抗英，其勢力比英格蘭強大，亨利八世自知自己毫無能力同時對抗法蘇，而娶西班牙國王阿拉貢的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of Aragon)之女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為妻，藉英西聯姻以制法國(Starkey 11-14, 24-26)。

在英吉利海峽的兩邊，無論是在歐洲大陸或是海洋，世界的角色是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Dynasty)所統治的神聖羅馬帝國、西班牙，以及稱霸中亞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Ottoman Empire)。其中，神聖羅馬帝國的勢力最龐大，因為，如班哲明·柯蒂斯(Benjamin Curtis)的研究指出，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Charles V)不僅統治了德國、匈牙利與波希米亞地區，還統一了西班牙(1516-1556)。在一五三〇至一五五六年間，查理五世更同時統治法國勃艮第(Burgundy)、荷蘭與義大利南部。查理五世一五五六年退位後，將西班牙交給兒子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of Spain)治理，直到一五九八年為止。菲利普二世繼位時，不僅繼承了查理五世所鞏固的江山，還與英格蘭的瑪麗一世(Mary I of England，又名瑪麗·都鐸[Mary Tudor]，1516-1558)成婚，順理成章地成為英格蘭的共同君主(1554-1558)。他再藉由聯姻政治之地利之便，控管西班牙的荷蘭屬地。西班牙在菲利普二世的領導下，與神聖羅馬帝國等諸國成立天主教神聖聯盟(Catholic Holy League)，多次聯手對抗屢屢侵犯邊境的鄂圖曼土耳其人。他更趁法國宗教戰爭內鬥之際(French Wars of Religion，1562-1598)，勵精圖治擴張海內外領土，並於一五八〇年統一葡萄牙，

成為葡萄牙國王。如此，菲利普二世順理成章的接管了葡萄牙的艦隊，從此，西葡的海上聯軍所向披靡。此外，菲利普二世還接管了所有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和資源，包括非洲、巴西、印度和有香料羣島之美名的摩鹿加羣島(the Moluccas)，成為海上霸主(Curtis 55-82, 84-106)。他的成就，替十六世紀的西班牙贏得日不落國之稱號。他的帝國勢力，不是早期的英格蘭敢望其項背的。

十六世紀中亞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以下簡稱鄂國）在蘇丹王塞利姆一世(Selim I 1512-1520)與蘇萊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1520-1566)的長期治理下，也趁勢崛起。鄂國領土不斷地往地中海、非洲及中亞地區擴張，因此威脅到神聖羅馬帝國(Kinross 21-80)。在十五與十六世紀，被基督徒視為「來自東方的魔鬼」(Devils from the East)的土耳其海盜(Hentsch 86)，對神聖羅馬帝國而言，不管是信仰或是政治，仿若芒刺在背，因此，歷史學者約希姆·惠立(Joachim Whaley)指出，神聖羅馬帝國的歷任皇帝（查理五世、斐迪南一世、馬克西米連一世和魯道夫一世）首要的外交政策就是要遏制鄂國的擴大(Whaley 24, 31-38, 54-55, 68-73, 87, 113-16, 124, 151, 164, 178, 218)。但是鄂國的塞利姆一世卻逕行越過歐洲大陸，在埃及建立鄂國政權，鄂國船艦更是航向紅海。一五二〇至一五六六年間，蘇萊曼大帝的勢力不斷西進：他在一五二一年佔領貝爾格萊德(Belgrade)、在「鄂匈戰爭」中(Ottoman-Hungarian Wars)征服了匈牙利王國的中南部地區，並且在一五二六年匈牙利境內（西部除外）以及其他中歐地區建立鄂圖曼土耳其政權。蘇萊曼大帝雖然在一五二九與一五三二年進攻神聖羅馬帝國首都維也納失利，但是卻順勢讓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瓦拉幾亞和(Wallachia)與摩爾達維亞(Moldavia)成為鄂國的附庸國。在歐亞交界處，鄂圖曼土耳其人在一五三五年從波斯人手中搶走巴格達，隨後在一五三八年擊敗西班牙-威尼斯艦隊，取得了控制美索不達米亞和進入波斯灣的海權。由於鄂國長期獨佔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主要陸路貿易通道，經濟得以蓬勃發展。蘇萊曼大帝的輝煌時代，標誌著鄂國的頂峰，帝國人口總計約一千六百萬，領土橫越三大洲，是個名符其實有主導地位的海權國家，控制大部

分的地中海航道(Whaley 50, 379-81, 582-88)。

十六世紀中葉，當亨利八世只能在邊陲守穩疆土，歐洲三列強的首要目標則是在重劃新舊世界的國家版圖、企圖爭相操控義大利那不勒斯、米蘭和威尼斯地區的貿易資源，以便控制通往威尼斯以東的貿易路線，並尋找新世界的殖民地。由於國與國不斷地競合，三強權與法國發生了長達六十五年的「哈布斯堡-瓦洛戰爭」(Habsburg-Valois Wars 1494-1559)，這些戰爭導致義大利文藝復興走向滅亡，因此又稱「義大利戰爭」(Italian Wars)(Mallett 1-6)。在戰爭中，神聖羅馬帝國的盟軍是西班牙，鄂國的盟軍是法國以及亟欲擺脫鄂國威脅的威尼斯共和國。英格蘭這個小國當然不是歐陸四國外交政策下的首要目標或敵人。亨利八世在歐洲政治深闢自己的位置，自知英國沒有能力得罪任何一方，在早期的外交上採中立政策，以避免捲入兩面不討好的耗戰(Mallett 130, 141, 150-51, 233)。

不過，亨利八世早期的中立策略在一五二九年宣告瓦解，因為凱瑟琳無法替亨利八世生子嗣，亨利與凱瑟琳的離婚決定，惹怒了凱瑟琳的侄子，也就是神聖羅馬皇帝查理五世（同時也是西班牙的統治者）。他不滿亨利的決定，因為這將嚴重影響英西關係，但是查理五世忙於平定鄂圖曼土耳其人的侵犯，不得不暫時冷處理與亨利八世間的緊張關係(Starkey 208-94)。此時的亨利八世知道查理五世和法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ois I)是世仇，確定查理五世絕不可能借道法國攻擊小國英格蘭。一五三四年後，亨利八世擅用法、西的恐怖平衡策略，成功地避免英格蘭與神聖羅馬帝國以及與法國的對立，用冷關係來換取英格蘭的安全(Starkey and Doran 60-73)。亨利八世雖與凱瑟琳離婚，他在歷史情感上一直是親西仇法，在一五二一至一五二六、一五四二至一五四六、一五五七至一五五九年間的義大利戰爭中，三次選擇性的派兵加入西班牙、教廷與神聖羅馬帝國的聯盟，以抗衡法國(Starkey and Doran 84, 105)。

亨利八世死後仍無子嗣繼承王位，¹ 導致英格蘭成為一個處處受制

1. 亨利八世的獨子愛德華六世(Edward VI 1537-1553)在十六歲時去世。他在位期間只有六年(1547-1553)。

於歐洲婚姻聯盟的被動政體。再加上英格蘭在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下(Religious Reformation 1529-1537)，國內有兩派宗教意見(天主教與新教)傾軋，² 使得亨利死後之三任女王陷入政治四面楚歌的狀態。英格蘭的瑪麗一世(1516-1558)、蘇格蘭的瑪麗一世(Mary I of Scotland，又名瑪麗·斯圖亞特[Mary Stuart]，1542-1587)與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都各有主張與政治盤算。英格蘭的瑪麗一世一五五四年繼位後，嫁給菲利普二世，以延續父親的英西結盟。他們的結合(1554-1558)意味著西歐勢力的重整。而蘇格蘭的瑪麗一世，則沿續多年蘇法的歷史血緣基礎，³ 嫁給法王弗朗西斯二世(Francois II)，在為期二年又二百二十五天的婚姻中(1558-1560)，她也順理成章地成為法國王后。但再精密的盤算也逃不掉命運的安排，由於英格蘭的天主教徒瑪麗一世和菲利普二世沒有子嗣，在瑪麗被同父異母的胞妹伊麗莎白一世處死後，儘管菲利普二世明知自己與新教徒伊麗莎白的信仰不同，基於現實考量，他仍向伊麗莎白求婚，企圖以第二次的英西婚盟，來制衡蘇格蘭與法國的締盟關係。誠如歷史學者柯林·潘吉爾(Colin Pendrill)所觀察，如果與伊麗莎白結盟成功，雙方都有既得利益：西班牙可利用伊麗莎白來監控法國的宗教戰爭與西班牙的荷蘭屬地，而伊麗莎白則可利用西班牙監控與蘇格蘭友好的法國吉斯家族(Guise Dynasty)(Pendrill 102-103)。然而，年輕的新教徒伊麗莎白不想成為西國附庸，且英國人民厭惡有優越感的西班牙，伊麗莎白在一五五九年婉謝了菲利普二世的求婚。一五五九至一五六七年間，儘管英西宗教分歧，他們之間仍保持相敬如賓的盟友關係。

而法國自從弗朗西斯二世突然因病去世(1560)、蘇格蘭的瑪麗一世因此改嫁族人亨利·斯圖亞特(Henry Stuart)之後(1565)，英法關係隨即生變。一五七〇至一五八一年間，法國瓦盧瓦家族(Valois Family)的兩位王子亨利·安茹公爵(Henry, Duke of Anjou 1551-1589)與法蘭西斯·阿朗

2. 見埃蒙·達菲(Eamon Duffy)之著作 *Saints, Sacrilege and Sediton: Religion and Conflict in Tudor Reformations* (London: Bloomsbury Continuum, 2014)，結合了作者先前已出版與未出版的文章，是研究都鐸時期宗教史的代表作。

3. 瑪麗·斯圖亞特之父母分別是蘇格蘭的詹姆士五世(James V of Scotland)與法國吉斯家族的瑪麗(Mary of Guise)。

松與安茹公爵(Francis, Duke of Anjou and Alençon 1555-1584)陸續向伊麗莎白求婚，希望藉英之力削弱西班牙。法王的求婚，在歷史學家艾莉森·維爾(Alison Weir)眼中，是場政治性十足的「婚姻遊戲」(208)。樞密院當然知道英格蘭這顆小棋的局勢，當女王想嫁法王之際，樞密院力阻，以確保英格蘭不加入歐洲競合之優勢。伊麗莎白從亨利八世所繼承的不僅是政治中立政策，還有徹底改變英格蘭命運的「宗教改革政策」，使得伊麗莎白後來得以藉宗教改革之名，擺脫被動主體之命運。

貳、新教、新信仰、新突破

新教的宗教改革對英格蘭的國運有決定性影響，因為歐洲新教徒政治勢力的整合，不僅幫助英格蘭獨立於歐洲天主教聯盟，還推波助瀾使英格蘭在十六世紀後期成為歐洲宗教迫害者的避難天堂。自從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鼓吹宗教改革以來，新教正悄悄削減天主教勢力。新教剛從德國傳到法國時，弗朗西斯一世一開始採取容忍態度。然而，當新教徒的貴族信徒在一五三四年公開詆毀天主教望彌撒的儀式時，宗教問題點燃政治的戰火，弗朗西斯一世認為新教的言論與挑釁將對國家穩定構成威脅，所以在法國境內處決新教徒的異端邪說(Goubert 92)。上萬名的法國新教徒因此逃離法國，最值得注意的是約翰·卡爾文(John Calvin)，他先移民到巴塞爾(Basel)，最後於一五三六年定居在日內瓦。卡爾文振筆疾書地批判天主教的《大公書信》(*The Catholic Epistles*)、攻擊天主教固有的腐敗、自滿與頑固，⁴ 並且有系統地培訓牧師，讓他們在法國宣揚新教，呼籲人們放棄天主教。儘管法國國王亨利二世(Henry II of France)在位期間(1547-1559)對新教徒進行大規模宗教審判，法國改革教會的勢力卻已逐漸滲透全國。

在宗教迫害的壓力下，法國新教的影響力日益增加。法國新教也逐漸衍生出一種特殊的政治性，使得越來越多的法國貴族皈依新教，而與

4. 克爾文對天主教《大公書信》的批判請見 *John Calvin's Commentaries on the Catholic Epistles* (<http://www.ccel.org/ccel/calvin/calcom45.pdf>)，1 Peter 2:9-10, 59; John 2:24-25, 174; James 1:19-20, 261。

信仰天主教的貴族發生一連串毀滅性衝突。這些不可妥協的衝突演變為長達三十六年的「宗教戰爭」(French Wars of Religion 1562-1598)。⁵ 戰爭期間，法國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由胡格諾家族[Huguenots Family]領導)間八次大規模的征戰與屠殺，讓法國自顧不暇、元氣大傷，駭人聽聞的暗殺暴行層出不窮。最慘烈的一次是發生在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由天主教徒凱瑟琳·德·梅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所主導的「聖巴塞洛繆日大屠殺」(St Bartholomew Day Massacre)。天主教徒利用慶典期間，在全國各地無預警地滅絕了新教徒，死傷人數近三萬，甚至波及西葡地區，使得西班牙與葡萄牙嚴厲執行更大規模的宗教大審判，強迫所有異教徒，包括回教徒、猶太教徒與新教徒皈依天主教，違者將被行刑或驅出國境(Knecht 54-69)。此舉造成一波波的非天主教徒流散到英格蘭、荷蘭、普魯士、瑞士以及這些國家的海外殖民地避難。這場征戰直到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 of France)在一五九八年通過「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調解了宗教紛爭後，才讓整個法國趨於安定。⁶ 儘管如此，新教徒在法國是少數，法國的官方宗教仍是羅馬天主教。

當伊麗莎白一世繼位後，必須同時處理政治競合與宗教戰爭兩件大事。眼看宗教問題分裂英法，她上任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開展亨利八世的宗教論述，利用「宗教協議」(Religious Settlement)推動她的政治主權。一五五八年她命令國會再次通過亨利八世在一五三四年已宣讀通過的「至尊法案」(*The Act of Supremacy, 1558*)，繼續承認英格蘭領袖伊麗莎白一世為英格蘭與英國國教的最高領導人(Supreme Governor of England and the Anglican Church)。⁷ 伊麗莎白更命令國會通過另一項最高權威法，稱作「1559年單一法令」(*The Act of Uniformity, 1559*)。⁸ 此

5. 有關法國宗教戰爭的歷史研究，請見法國文藝復興史史學權威 Robert Knecht, *The French Religious Wars* (Wellingborough: Osprey Publishing, 2002) 51。

6. 請見 Bernard Cottret, *L'Édit de Nantes 1598: pour en finir avec les guerres de religion* (Paris: Perrin, 1997)。

7. 伊麗莎白一世的「至尊法案」全文請見 <http://www.legislation.gov.uk/aep/Eliz1/1/1/contents>。

8. 「1559年單一法令」全文請見 <http://history.hanover.edu/texts/engref/er80.html>。

法案完全廢棄教廷權威、任命坎特伯里大主教為聖公會(Anglican Church)之宗教領導人，同時英格蘭國會再次命令在英境內禱告的所有人，要統一使用以英文撰寫、以馬丁路德禱文(Litany)為範本、並且在基礎神學、崇拜禮儀等方面都與羅馬天主教儀式迥異的《公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參、新教國家的成立

新教在德國、瑞士、法國、荷蘭、英格蘭與蘇格蘭地區成立改革教會後，其重整後之勢力，讓英格蘭與荷蘭大膽地突破舊勢力的競合，成為新教國家。伊麗莎白通過上述兩項法案後，讓先前受天主教徒瑪麗一世迫害而逃亡到荷蘭、瑞士的強硬派新教徒返回倫敦，他們對新局充滿期待，自然也對對抗西班牙的荷蘭新教叛軍深感同情。新教勢力的坐大讓教皇坐立不安，他計劃將伊麗莎白永遠開除教籍(Excommunication of Elizabeth I)。但菲利普二世勸教宗作罷，因為他認為此舉將會讓歐洲新教勢力更加鞏固難以摧毀。知名歷史學家蘇珊·多倫(Susan Doran)指出，這股新教力量若形成，勢必會損害西英的外交關係(53)。教皇庇護五世(Pope Pius V)接受菲利浦的建議，因此遲遲沒有開除伊麗莎白女王之教籍，直到一五七〇年，教皇終於忍無可忍頒布了教廷詔書(Papal Bull [*Regnans in Excelsis*])，⁹ 開除伊麗莎白，宣告她為異端，並警告企圖與英格蘭結盟的友邦，凡是任何效忠伊麗莎白女王的國家，將會被逐出教會。此舉無異向歐洲大陸的新教徒宣告，英國是個歡迎新教移民的新教國家，新教徒都寄望伊麗莎白能夠轟轟烈烈地為新教幹一場大事業，因此產生了大批的新教徒流散到英格蘭(Nicholls 207-29)。

教皇的命令使得英西關係生變，因為英荷新教勢力開始整合抗西。荷蘭原是神聖羅馬帝國與西班牙所共同統治的低地地區(Low Countries)十七聯邦行省之一，由於菲利浦二世殘害新教徒，荷蘭亟欲脫離神聖羅馬帝國與西班牙的統治。一五六〇年拜法國宗教戰爭之賜，荷蘭新教徒

9. 教廷開除英國女王教籍之詔書全文，請見天主教文獻 <http://www.papalencyclicals.net/Pius05/p5regnans.htm>

在一五六六年開始反抗羅馬天主教，荷蘭船隻也逕行航向加勒比海與南美地區，引起西荷「八十年戰爭」(Eighty Years' War 1568-1648)，此役又稱「荷蘭獨立戰爭」(the Dutch War of Independence)。¹⁰ 論宗教情感，英格蘭是偏袒荷蘭的，儘管西班牙多次要求英格蘭協助出兵荷蘭平定獨立抗爭，英格蘭遲遲沒有動作。伊麗莎白從荷蘭獨立運動中看到機會，想藉地緣之便，藉此機會與荷蘭展開政治與貿易合作。女王授權英格蘭號稱「海狗」(Sea Dogs)的英國海盜出沒在英吉利海峽，暗中襲擊西班牙船隻，她更默許由荷蘭領主授權、號稱「海乞丐」的荷蘭海盜(Sea Beggars)，共同在英吉利海峽洗劫西班牙的黃金船，將貨物運到英國販賣，因為英荷當下的共同目標是聯手脫離西班牙勢力(Bicheno 29, 103, 377)。一五八〇年英格蘭進一步暗中軍援荷蘭新教徒叛變，致使荷蘭共和國(The Dutch Republic 1581)的成立，英西從此決裂。

荷蘭獨立前後，英格蘭在一五七〇至一六〇〇年間，趁西班牙與法國在海外爭奪殖民地之際，積極派法蘭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探索新世界，陸續發現並占領格陵蘭島和加拿大(1576-78)、南太平洋和位於北卡羅萊納州的羅阿諾克島(Roanoke Island)與維吉尼亞(1584)，完全不顧西葡一世紀前瓜分世界時所簽訂的「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 1494)和「薩拉戈薩條約」(Treaty of Zaragoza, 1529)，而踩到西班牙的紅線。西班牙因此沒收伊比利亞海上的英船與貨物，英格蘭則聯合荷蘭掠奪西班牙船隻以彌補其損失。菲利浦二世再也難忍英荷坐大，因此派無敵艦隊(the Spanish Armada)大舉揮軍進攻英格蘭，目的要推翻伊麗莎白及消滅新教。英西大戰終於在一五八八年爆發。在軍事配備與規模上，西班牙與英國完全不成比例。權威歷史學家蘇珊·布里格頓(Susan Brigden)指出，西班牙有擅於海戰的大型船一百三十艘，其中包括各式各樣的軍艦及武裝商船，而英格蘭的二百艘船隻皆屬中小型軍船，所配的槍砲遠比不上西班牙火力強大。可是天助英格蘭，一場颶風吹散了西班牙的船隻陣勢，西班牙共有六十一艘軍艦毀於不良氣候，死

10. Marjolein 't Hart, *The Dutch Wars of Independence: Warfare and Commerce in the Netherlands, 1570-1680* (London: Routledge, 2014).

於船難的西軍有兩萬多名，無敵艦隊敗給了命運。英格蘭僥倖獲勝，死亡人數僅八千多人，船艦也只有八艘被燒毀(Brigden 290-310)。¹¹

戰後的西班牙國力岌岌可危，因為一五八八至一五九八年間西班牙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海外探索與殖民，造成軍事過度擴張而必須以債舉債。加上西班牙大規模進攻英格蘭，而且征討法國的新教國王納瓦拉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失利，拖垮國內經濟，菲利浦二世因此惡性循環地提高賦稅來因應多方戰事。西班牙歷史學家 J. H. 艾略特(J. H. Elliott)的研究顯示，高稅收與通貨膨脹使得西班牙人的生活日益惡化，滋生越來越多不滿。比如說，菲利浦一五九五年的花費高達一千二百萬達克特幣(ducats)，他的現金收入有 25% 是金條，但其餘皆由舉債與課稅得來。再加上從一五九六至一六〇〇年間，西班牙境內發生了嚴重的瘟疫，死亡人數與年成長人數相互抵消，而且通膨使得工資增加 30%、玉米價格（西班牙主食）上漲了 250%、商品價格一口氣漲了四倍，此外，西班牙還有高達上千萬達克特幣的債務要解決，而國家的固定年收入不到一千萬(Elliott 101-104, 169-79, 284-85, 321-61)。

歐陸戰爭所引起的動盪，造成了不同文化型態的流散與移民，許多渴望安定的法、葡、西甚至是流散到各地的新教徒與猶太商人(marranos)出走歐洲(Berek 128-62; Campos 599-616)，¹² 逃到無戰事的英格蘭與海外殖民地避難。他們把倫敦視為離歐洲最近的海上新城與避難天堂。伊麗莎白在位最後二十年時，將敵人西班牙帝國視為模範，積極將英格蘭打造成另一個日不落國，倫敦因此成為舊世界中的新首都。儘管亨利八世只留給伊麗莎白早期探索的不毛之地如紐芬蘭(Newfoundland)，一五五一年只能在遠在俄羅斯重要港口阿爾漢格爾斯克(Arkhangelsk)設立瑪斯科維貿易公司(Muscovy Company)，與俄羅斯以及波斯地區進行貿易活動(Brigden 274)，¹³ 伊麗莎白並不畫地自限，反而趁法國、西班牙

11. 布里格頓將英格蘭之勝利稱作「上帝的審判」(“God’s Judgements”)，頁 248。

12. “Marrano”是一羣被迫皈依天主教的葡萄牙猶太人，從西班牙逃到葡萄牙後再遷徙到英格蘭，他們表面上信奉天主教，但仍信奉猶太教。這些猶太人也是成功的經濟移民。

13. 最早的歷史文獻為 Armand Jacques Gerson, Earnest Vancourt Vaughn, and Neva

自顧不暇之際，徹底甩掉宗教包袱，積極在鄂圖曼土耳其與威尼斯地區成立「東昇公司」(the Levant Company 1581, 前身為「東方公司」[Cathay Company] 1576)，相繼成立的還有在非洲的摩洛哥巴巴里公司(Barbary Company, 又稱摩洛哥公司[Morocco Company] 1585)，在北非地區發展獨佔的砂糖貿易，以及與印度和印尼來往的「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1600)(Sherman 21)。女王的探索家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最顯著的成就還包括經由環球航行而發現的南太平洋，進而去掠奪西班牙的海外基地(Brigden 278-94)。伊麗莎白後期的成就明顯與亨利八世時期有所區別：突襲、偷襲、反制等大動作都證明英格蘭企圖建立一個直達遠東貿易的決心。文藝復興時期劇作家、也是第二代荷蘭移民湯瑪斯·德克爾(Thomas Dekker 1572-1632)獻給伊麗莎白女王登基四十週年紀念的宮廷劇《幸運老叟》(*Old Fortunatus*, 1599)分別用「東遊」與「西進」的政治比喻來刻劃、回顧伊麗莎白女王的一生與彰顯英格蘭崛起的堅決意志。劇中「東遊」指的是英格蘭與鄂圖曼土耳其的暗通款曲以對抗西班牙，「西進」指的是歐洲諸國王子(法、西、鄂)向西旅行到倫敦向英格蘭公主求婚。倫敦在劇中被建構為「地方奇蹟」(3.1.252)，讓世界景仰，不僅歐洲王子前來朝聖，還將世界強權納入地方。旅遊因此構成該劇最重要的政治隱喻，是英格蘭面對歐洲變與動、世界與地方所展現的決策與抱負。

肆、世界與地方：英格蘭的新時代意志

十六世紀這一百年來，歐洲局勢的變化帶給英格蘭巨大的震撼，刺激之下，英格蘭經歷了不同層次，如世界的、國家的、地方的、本土上的改變。世界的改「變」，造就了地方各層面的多元流「動」。「動」指的是人口、經濟、資本、語言、文化、疾病的流動，其內涵有宗教移民、經濟移民、猶太流散、宗教反動、政治撼動、資本流動、語言歸化、文

Ruth Deardorff,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Commerce in the Tudor Period: The Organizatio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Muscovy Compan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12)。

化變動、疾病傳播等議題。以上任何一種層面的流動表現，都具體呈現了英格蘭主動與被動的開放性，即使位處邊陲，也不得不正視世界的巨變。

面對世界，英格蘭從他者的變與動，看到自己在世界地圖中政治地理的特殊性、策略地位與趁勢崛起之機會，也就是說，英格蘭的存在價值（如上述的中立與恐怖平衡政策、新教主義、邊陲策略）對於歐陸強權來說，不管是剩餘、殘餘、或是多餘，在世界改變之際，她不起眼的陰性力量(feminine power)確實挑戰了以歐洲勢力為中心結構的事實，突顯了英格蘭位居邊陲、劣勢、次要的沉潛反彈空間。法國的宗教戰爭與西班牙的衰退，乃造就英格蘭邁向新世界的切入點，對於這一點，具備政治韌性的英格蘭有計畫性地開展屬於她的新時代意志。

世界概念的形成與版圖的重劃，刺激了英格蘭人對於自我形象(self-image)與城市的反省與建構。十六世紀對世界的概念乃具象化於世界創造上(world-making)，那時最著名、最具影響力的世界地圖有法蘭德斯人傑拉杜斯·麥卡托(Gerardus Mercator 1512-1594)以投影法繪製而成的《新世界地理圖》(*Nova et Aucta Orbis Terrae Descriptio ad Usus Navigatium Emendate*, 1569)。該圖啟發亞伯拉罕·鄂特里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 同為法蘭德斯人)繪製有《世界劇場》(*Theatrum Orbis Terrarum*, 1570)之稱的世界地圖集。這些地圖改變了英國人的菁英教育，閱讀地圖乃成為英格蘭大學教育的一部分。雷斯莉康麥克(Lesley Cormack)指出，牛津、劍橋大學在一五八〇年將地理課程學術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 study of geography)，教授歐洲最先進的測量、製圖理論與實踐，結合歷史、數學與自然哲學學科，以跨領域之思維厚植對世界的認知，進而發展更具務實效益的地理研究，如數學地理(mathematical geography)、航海術(circumnavigation)、敘述地理(descriptive geography)、地方誌(chorography)等重點領域，這些未來的政治菁英藉由視圖、測量與算術，來培養必備的世界觀以及邁向帝國的文化地理意識(Cormack 113)。文藝復興時期歐洲航海家和探險家理查·黑克盧伊特(Richard Hakluyt 1552-1616, 牛津人)的《英國主要的航海、航道、交通與地理

發現》(*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i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1589)就是部重量級的敘述地理(共十六大冊),該書以實證航行與專門知識所撰寫而成,記錄英格蘭在一五七〇至八〇年代的海外拓展、英國與世界的海洋網絡。另一位精通地理的政治菁英是牛津人坎特伯里大主教喬治·艾博特(George Abbot),他的《世界簡述》(*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1599)是一本較通俗的著作,以文字敘述世界地理,將英格蘭放在全球的大脈絡,從世界論述自己,誠實標示英格蘭的地理文化座標。

在知識機械化生產的年代,隨著這些地圖與相關出版品的流傳與再版,它們除了強化英格蘭繪製本國地圖的國家意識,更刺激了繪製地方的地方藝術,兩者攜手突顯英國主體性,共同造就雙軌的倫敦人世界觀。比如說,當英格蘭官方積極地生產了一系列測量精準的世界地圖、打造伊麗莎白的國家圖像後,¹⁴ 知識分子也開始創建地方意識。劍橋學者克里斯托弗·薩克斯頓(Christopher Saxton 1540-1610)的《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縣地圖集》(*Atlas of the counties of England and Wales*, 1580)是第一本以圖詳載英國境內各郡地圖的地方誌。牛津學者威廉·卡姆登受到鄂特里斯的啟迪,製作偉大著作《大不列顛志》。該作品是大不列顛與愛爾蘭的地形和歷史考察,以地方誌詳細論述各郡的風景、地理、古物與歷史,目的在「以古風恢復不列顛;以不列顛榮耀古風」(Camden 1)。¹⁵ 前輩的著作鼓舞了另一位也是牛津出身的地方誌地理歷史學家約翰·諾登(John Norden 1547-1625),他出版《不列顛的鏡子》(*Speculum Britanniae*, 1593),以平易近人的方式記錄英格蘭各郡的地方史與地形圖。還有一位土地測量家叫做拉爾夫·阿嘎斯(Ralph Agas 1540-1621),他前所未有地替英國重要城市如牛津、劍橋、倫敦等城市量身訂做了鉅細靡遺、鳥瞰式的城鎮地圖,精準呈現市區的建物、地景、街道與地標,這些立體

14. Roy Strong, *The Cult of Elizabeth: Elizabethan Portraiture and Pageant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7); *Art and Power: Renaissance Festival 1450-1650* (London: Boydell Press, 1999).

15. 卡姆登於一五八六年出版之《大不列顛志》(*Britannia*)乃以拉丁文寫成,在一六〇一年英譯本中之扉頁(“Author to the reader”)處特地說明其出版目的。

繪圖技術所製成的地圖分別出版於一五七八、一五九二與一五七〇至一六〇五年間。阿嘎斯的地圖中所展現的文化樣貌對於另一位與眾不同的地方誌史家、也是沒上過大學的愛國本土平（貧）民史家約翰·史鐸影響甚遠。

史鐸廣泛地涉獵前輩所蒐集的史料與地圖(Gadd and Gillespie 27-37)。除了窮盡畢生精力與財產，以徒步的方式收集中世紀後期的英國文學手稿(manuscripts)、宗教與市政檔案(ecclesiastical and civic records)、名冊(rolls)、契約(indentures)、遺囑(wills)，並彙整英史年鑑，撰寫《英史摘要》(*A Summary of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1565-1610s*)與《英國年鑑》(*The Annals of England, 1592-1615*)，還編輯《喬叟全集》(*Th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 1561, 1598, 1602*)。一五九〇年起，史鐸以威廉·菲茨斯蒂芬(William Fitz-Stephen)的史料為藍本，著手撰寫《倫敦志》，記載倫敦市從神話時期至一五九八年以來的城市史，堪稱英國第一部城市史。史鐸以城市導覽的視野，敘述倫敦城內每一區(Ward)的地理特殊性與歷史，文類包含了專屬英國的城市傳記(city biography)、地方風俗誌(chorography)、城市編年體(town chronicle)，人物列傳(biographies)與時間地誌(topography of time)。在敘述體上，《倫敦志》屬旅行紀錄(travelogue)，以城市大觀回應當時極盛一時的海外遊記。在情感上，史鐸的作品深刻反映了倫敦人的民族觀與心靈地理(psychogeography)。他的著作對於英格蘭地方人物與地理空間的藝術創造，以及城市喜劇(city comedy)的興起有莫大影響。

鑒於各方史家努力建立英國主體性，再加上歐洲文化的刺激，英格蘭的地方意識日益自信厚實，影響市民最深的是倫敦的快速成長以及英國本位主義的興起。相較於歐洲舊城如羅馬、威尼斯、安特衛普與巴黎，倫敦在十六世紀初僅為五萬人左右的小鎮，而且大部分的倫敦人都居住在城內。一五九八至一六〇三年間，因為外來移民的湧入以及都市化的影響，倫敦外圍地區迅速擴大，人口成長達二十萬(de Vries 140, Appendix I; Harding 14-15)。這個城市空間在早期所受到的歐洲文化與語言衝擊是

想當然爾。新移民移居倫敦後，¹⁶ 除了帶來強勢、多元的歐洲傳統，在文化上，也主導了倫敦人的生活品味。比如說，倫敦主要商業街道的建築，如皇家交換所(The Royal Exchange)、奇普賽德(Cheapside)，稻坵街(Cornhill Street)，芬雀奇街(Fenchurch Street)等，都充滿了濃厚的古典義大利風格與法蘭德斯風格。在語言表現方面，一五九〇年以前，歐語強勢，英語弱勢，知識分子的共通語言是拉丁文。英國的中上層階級的家庭通常會聘用移居英國的外國人，教授家僕與家中女子外國語，如拉丁語、法語、義語與西班牙語，畢竟英格蘭的母語英語只是一個在英吉利海峽以西才被使用的方言，不管是拼字、文法、發音、系統與出版，尚未被標準化，更遑論學術制度化，英文的地位當然無法與古老歐語相提並論。

這些第一、二代的歐洲移民、猶太移民，以及到英國經商的荷、法、西、葡、義等國人，把歐洲文化傳統帶到倫敦，英國人則用英語轉譯歐洲演義，所影響的層面遍及社會，最具佐證代表性的是反映人生的戲劇。一五七〇至一五九〇年代有票房保證的通俗戲碼，大多是以歐洲古典與當代外國文學與歷史為題材。以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性劇作家為例，威廉·莎士比亞(1564-1616)喜劇和悲劇的場景大多設在古典文明的歐洲，如義大利(《羅密歐與朱麗葉》、《維羅納的二紳士》、《威尼斯商人》)、希臘(《錯中錯》、《仲夏夜之夢》、《如你所願》、《泰蒙的雅典》等)、古典羅馬(《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凱撒大帝》、《安東尼和克婁巴特拉》、《科利奧蘭納斯》、《辛白林》)與特洛伊(《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等。克里斯多福·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的作

16. 有關於歐洲移民定居倫敦之歷史研究與文化接觸，請見 Alan Haynes, "Italian Immigrants in England, 1550-1603," *History Today* 27.8(1977):529-34; Michael Wyatt, *The Italian Encounter with Tudor England: A Cultural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Lien Bich Luu, *Immigrants and the Industries of London, 1500-1700* (Aldershot: Ashgate, 2005)。另外，專門討論文藝復興戲劇中的外國人意象的研究，請見 Lloyd Edward Kermode, *Aliens and Englishness in Elizabethan Dra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A. J. Hoenselaars, *Images of Englishmen and Foreigners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 (Rutherford: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品《帖木兒大帝》上下集(*I & 2 Tamburlaine*, 1587)、《浮士德的悲劇》(*Doctor Faustus*, 1589, 1593)、《馬爾他的猶太人》(*The Jew of Malta*, 1589)、班·強森(Ben Jonson)的《辛西婭的狂歡》(*Cynthia's Revels*, 1600)、《打油詩人》(*The Poetaster*, 1601)、《塞揚努斯的毀滅》(*Sejanus His Fall*, 1603)、《判官凱特林的陰謀》(*Catiline His Conspiracy*, 1611)中，充滿了英國作家對歐洲古典風格的景仰。歐洲戰事也影響了倫敦戲碼的走向，如荷蘭移民的後代德克爾與麥可·德雷頓(Michael Drayton)合著的《法國內戰》三部曲(*Civil War of France I & II & III*, 1598)，報導法國的宗教戰爭。喬治·皮爾(George Peele)的《城堡之戰》(*The Battle of Alcazar*, 1591)描寫葡萄牙王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King of Portugal)進攻摩洛哥的戰役。已失傳的劇本《菲利浦二世》(*Philip II of Spain*)，從劇名推測，應該是部介紹西班牙領導人之作。¹⁷

歐洲演義在戲院的強力放送，讓不少英國劇作家發現了英國題材的嚴重缺席，他們明顯感受到這種本國文化代表性不足的危機。因此，倫敦最重要的玫瑰劇院(the Rose Playhouse)與環球劇院(the Globe Playhouse)中的當地作家，如湯瑪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自許是英國人的德克爾、湯瑪斯·米德爾頓(Thomas Middleton)、還有那些在菲利浦·亨斯洛(Philip Henslowe)的劇院工作過的所有作家，開始撰寫與本地人生活息息相關、以倫敦生活為體裁的城市喜劇。在倫敦這個新的文化空間裏有異鄉人與本地人。異鄉人在倫敦這個興起的城市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舊大陸的他者，一方面提供英國人文化模式的選擇與模範，一方面也刺激英國人用新興文類城市喜劇闡揚自我的文化論述。在倫敦城市喜劇的劇本裏，市民對歐洲文化並非全盤接受，對於外國人的刻畫，以及對外來語、外國風，也有許多排斥與看法。在此文類中，倫敦人的定義也不單只是講方言的英國人，還有歐洲人第一、第二、第三代移民，他們共同創造共生的文化空間。在此空間中，人與人的文化關係，就好比歐洲語言與英文，互相碰撞、了解與融合，雙方透過彼此，

17. 這些戲碼大部分羅列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劇場大亨菲利浦·亨斯洛(Philip Henslowe)的戲劇帳冊《亨斯洛的日記》(*Henslowe's Diary*)之手稿中。

激盪出英國的本位主義與文化融合後的文化歸屬。

伍、新民族信仰：城市喜劇《英國人是我的選擇》

在新城倫敦，有關國內社會文化表現的戲劇文學作品多如雨後春筍，市民對於歐洲變動所產生的不同觀點，都反映在城市喜劇裏，構成倫敦人看世界的直接歷史證據。新流派城市喜劇是英格蘭在歐洲文化衝擊與經貿交流下的產物，在一五九八年史鐸的《倫敦志》發響後，大為盛行。城市喜劇又稱「市民喜劇」(citizen comedy)(Gurr 165)，它果斷地拋棄了歐洲題材，不以歐洲歷史與歐洲的統治者為故事主軸，劇中沒有打鬥場景的史詩與戰爭，也沒有爾虞我詐的政治暗殺或宗教鬥爭。相反的，相較於有政治隱喻的世界旅遊文類，城市喜劇呈現市井小民的居家空間與地方特色、放大特寫倫敦人的日常生活與芝麻小事、刻劃倫敦地理的特殊性與功能性，以彰顯在城內旅遊下，作家對小地方與小人物的縝密觀察與審視。城市喜劇的人物以中產階級商人及其家庭為主角，所上演的是以倫敦某街道、巷弄、商店、家庭為主的戲劇人生（如《倫敦的三女士》[*The Three Ladies of London*, 1584]與《倫敦的三老爺和三夫人》[*The Three Lords and Three Ladies of London*, 1589]），以某職業為刻劃對象的工作場景（如《倫敦四學徒》[*The Four Prentices of London*, 1592]與《製鞋匠的假期》[*The Shoemakers Holiday*, 1599]）。城市喜劇的主題含括市井小民的性格特寫、婚姻抉擇、經商成敗、職業對立、道德瑕疵、意識形態、以及世代隔閡的生活寫照與諷刺等(Gibbon 13-15; Leggatt 33-53)。城市喜劇的內容雖有文化、意識形態的衝突，但結局終究是以喜劇收場。在語言表現方面，劇中的倫敦人只講英語，不再獨尊歐語。以演出目的而言，城市喜劇的最終目的乃提出倫敦人塑造地方的文化論述、倫敦人俗化歐洲文化與歸化英國文化的政治意義、倫敦人回應時代改變的反思、以及倫敦人最終的情感歸屬，劇中以建構英國文化勝利為依歸。

威廉·霍頓的城市喜劇《英國人是我的選擇》是城市喜劇文類中最

獨特的代表作，¹⁸ 第一、它享有文學史上第一部城市喜劇的殊榮、開創性地自我界定何謂城市喜劇，其代表性不可言喻(Rowland 21-36)。第二、相較於其他以古典、近代歐洲為主題的劇本，《英國人是我的選擇》完全不使用拉丁文，劇中歐洲第二代移民不僅俗化歐語、認同英文，還企圖以英文來逆轉歐洲與英國、世界與地方的關係，強勢建立英文在倫敦經濟市場競爭與文化競爭下的本位主義。第三、該劇刻劃市民的生活街道，以認識地方、閱讀地方、建制地方的藝術，替市民開拓城市地理之概念。第四、該劇不再崇拜歐洲城市，反而以世界的角度，來慶賀倫敦生活的富裕，確切提供倫敦人看世界的文化觀點。第五、《英國人是我的選擇》是一部否定歐洲強勢文化優越感的本土城市喜劇(Bartolovich 151)，劇中英國文化與語言對英國的第二代移民而言不僅是正統，也是唯一選擇，其論述具體構成英國建立本位主義的確切證據。

《英國人是我的選擇》以一五九八年忙碌喧囂的倫敦城與歐洲、北非以及地中海地區的商業往來、文化流動為歷史背景，所探討的是歐洲移民第二代定居英國後的婚姻選擇與文化歸屬的故事。故事中的靈魂人物為名叫畢沙羅(Pisaro)的猶太移民，他從西班牙經葡萄牙到倫敦經商，因為看上了倫敦的安定與機會，因此將三十二艘船遷到倫敦，在此定居投資，娶英國女人，兩人有三女，分別叫做羅塞西亞(Laurentia)、瑪萊娜(Marina)與瑪西亞(Mathea)。老婆死後，有雄厚資本且精於算計的畢沙羅繼續以倫敦為基地，用現金買賣貨物，從不賒帳，他所投資的船隻在北非的黎波里(Tripoli)、巴巴利(Barbary)、西班牙、經地中海到義大利與土耳其地區，有頻繁的貿易來往。他的致富之道除了投資地中海地區的進出口貿易外，還放高利貸給需要資本的倫敦人(1.16-20)。英國境內許多有土地、沒資本的英國仕紳，知道畢沙羅的財力雄厚，便將土地抵

18. “for my money”是英文俚語，在《牛津英語大字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釋是，「我覺得、依我看」(“in my opinion,” “in my judgement”)的意思。所以 *Englishmen for My Money* 的白話語意乃「依我看還是喜歡英國人好」，故譯「英國人是我的選擇」。這個劇本沒有現代版本，閱讀、引述相當困難，故採用 Natalie J. C. Aldred 的版本“*A Critical Edition of William Haughton’s Englishmen for My Money; Or A Woman Will Have Her Will*”。

押給畢沙羅以借用現金，且希望透過畢沙羅的歐洲人脈，投資在地中海地區的事業（第二幕）。其中三位與畢沙羅有債務往來的英國仕紳分別是哈維(Harvey)、海翰(Heigham)、沃葛雷夫(Walgrave)，他們分別愛上畢沙羅的三個女兒，這三位女士對他們情有獨鍾，雖然知道他們求愛的目的不是只有單純的愛情(11.202-03)。¹⁹ 但是她們對於嫁給英國人、成為道地的英國人這件事，卻有高度的文化歸屬感。她們向追求者表示，除了會利用婚姻關係來幫他們取銷欠畢沙羅的債務(2.140-44)，還冀望他們有一天能共同繼承父親的龐大資產。

畢沙羅當然知道這三位英國人的意圖，因為女兒對他來說，是經營商業婚姻關係中的籌碼。有強烈歐洲文化優越感的畢沙羅，雖然深知在倫敦做生意的潛規則，也就是他做生意時必須說一口流利、漂亮、且毫無口音的英文，但他卻不樂意女兒們嫁給英國人(1.125-32)。他認為，女兒應該保有歐洲文化血統、受歐洲大陸教育、學歐語與音樂。因此，務實且現實的畢沙羅，解僱了女兒原本的家庭教師安東尼(Anthony)，因為他認為牛津學究安東尼除了教英文外，只會教些沒用且抽象的道德哲學，這些教育對女兒的擇偶與文化歸屬毫無益處。畢沙羅心中的最佳女婿人選是他的生意夥伴兼好友，分別是法國人得利昂(De Lyon)、義大利人阿瓦羅(Al Varo)與荷蘭人范達爾(Van Dal)，他們在歐洲與倫敦都有資產。畢沙羅盤算，若他們與自己的女兒成親，他們的資本將有莫大的加乘作用，因此，他費心安排老外與女兒的親事。儘管如此，畢沙羅卻不知道那位被他解聘的安東尼，其實是穿梭於英國仕紳與女兒間的中間人。透過安東尼居中傳遞情書與信物(1.66-98)，六人得以暗通款曲，他們互許終身的決心亦不可被動搖。

畢沙羅解聘安東尼後，請家僕弗里斯科(Frisco)在人來人往的聖保羅教堂的步道張貼公告，徵聘能教法語、義語、荷語以及音樂的老師(1.163-66)，安東尼這次戴上假鬍子，佯裝成法國老師，改名叫木須先生(Monsieur le Mouché)，又混進畢沙羅家當家教，繼續他的情報工作。

19. 在第十一幕中，沃葛雷夫說英國弟兄說：「我們要從畢沙羅的女兒那弄到土地，而且在她們的腹中取消我們的欠款」(11.202-03)。

畢沙羅白天都在倫敦的金庫區(the Bourse)還有皇家交換所的期貨市場做生意(第三幕)。有一天,消息傳來畢沙羅等股東所投資的英國船隻(財富號、冒險號、倫敦好運號),在行經義大利航行到土耳其途中,被西班牙人給劫了(3.98-117),因此畢沙羅邀請三個英國債務人回家吃午飯,準備商談此事。但消息靈通的義大利人阿瓦羅跟畢沙羅通報,剛才的消息錯誤,是西班牙的船沉了,他們的英國船現在已航行到克里特島,平安無事。畢沙羅一高興,忘了他先前已經請三位英國人到家裏用餐,也興奮地邀了得利昂、阿瓦羅與范達爾一同回家享用膳。

霍頓所刻劃倫敦的居家空間裏,展現出語言文化在經濟文化交流下所產生的衝突。當畢沙羅興高采烈地把他的三位外國友人帶回家,介紹給女兒認識時,家中興起一種莫名的集體仇外情節(collective xenophobia)。這三位老外一出場,舞臺上所展現的是截然不同的聽覺效(笑)果與景觀。三位老外穿著有歐洲風格的服裝,一開口卻說著一口破英文,不僅有濃濃的外國腔,還夾雜著聽不懂的外來語,使得溝通出現了莫名的障礙。家僕弗里斯科排斥用法語與得利昂交談,他在旁白中用狀聲詞,嘲諷像豬叫聲的法文(“ah oui, ah oui!” 1.170),他說「豬與法國人都說同樣的語言」(1.174-78)。荷語對弗里斯科來說,充滿空氣,在嘴巴咕嚕,像在發牢騷(1.181-83)。弗里斯科對義大利有根深蒂固的成見,覺得要分辨一個人是否為義大利人,從衣服與面相可略知一二,因為義大利人除了眼神淫蕩、穿衣愛現,還有著惡魔的面孔(1.191-92)。霍頓在外國人的對白中,大量使用擬聲詞以及混雜式文法與句法,使得觀眾在觀賞表演、或讀者在閱讀劇本時,對這些老外的發音、用語難以理解,而自然而然產生文化排斥現象。

家中的緊張關係因為三位英國人的到來而更顯緊繃。哈維、海翰與沃葛雷夫抵達畢家用餐時,畢沙羅的態度不變,竟說自己完全不記得曾邀請過他們這件事,並在旁白中表明自己非常討厭英國人。這些歐洲追求者眼看情敵到來,紛紛積極表述自己的文化優勢。荷蘭人范達爾向羅崙西亞說,嫁給他會是個不錯的選擇,因為他會帶她回荷蘭,在那邊,安特衛普的布料很昂貴,賣的都是奢侈品,而大城阿姆斯特丹,可是只

有荷蘭人才有權利在那裏做生意呢(5.4-16)！但無論他說甚麼，羅崙西亞就是不喜歡范達爾那些「結結巴巴的半個句子」(6.4)。得利昂則是用法國人慣有的文化肢體語言向瑪西亞求愛。瑪西亞眼看得利昂的肢體動作頻頻，馬上露出她厭惡法國人說話的樣子，她覺得法國佬講話老是吞唾沫，愛講一些“ça, ça, ça, pardon moi”的語助詞，認為法語盡是些「莫名其妙的話」、是「疾病」，也是「豬的語言」(4.96-97)。得利昂對瑪西亞毛手毛腳，眼睛亂瞄，使瑪西亞覺得十分不舒服。一旁的阿瓦羅則以精通義大利古典文學為自豪，自願當瑪萊娜的人生導師，用一輩子來教導她義大利文明。不料，瑪萊娜則說她不喜歡義大利古典故事中的猥褻色情，那些故事既變態又亂倫(6.31-39)！追求者阿瓦羅牽她的手時，有些動作令她作嘔，比如說在她手心搔癢、擠眉眨眼、齙牙裂嘴的笑等(6.40-42)。這些女子以英國的文化本位主義，徹底逆轉了當時佔上風的歐洲文化優勢和禮儀。在第六幕中，當得利昂想測試哈維、海翰與沃葛雷夫的法語程度而用法語交談時，他們完全不回應，故意雞同鴨講(6.63-106)。畢沙羅的女兒當然是站在英國人這方，羅崙西亞不加修飾地嫌棄有口臭的荷蘭人范達爾不會講英文(6.126-28)，瑪西亞與瑪萊娜叫得利昂少來煩她們(6.133-34)！她們不用佩脫拉克求愛傳統那套唯美濫情的幻象，毫不妥協地堅持在英國求愛一定要用英文，否則免談(6.157-60)！

畢沙羅見情況不對，知道女兒不可能接受外國人，因此想出荒唐計謀，叫三位老外在半夜佯裝成哈維、海翰與沃葛雷夫，到女兒的臥房，上她們的牀(6.225-41)，到時生米煮成熟飯，女兒不接受也難(7.1-9)！木須先生(安東尼)知道後，趕緊向英國友人通報畢沙羅的詭計(6.315-19)。三位女士知道此事後，誓死不嫁老外，瑪西亞憤恨的說：「我們堅決要自己作主！決不嫁老外！」(6.184-85)，而哈維、海翰與沃葛雷夫決定守在畢家門口，捍衛愛人的抉擇。

這三位粗鄙的老外得知畢沙羅的計謀後，欣然接受，但問題來了，老外對倫敦的地理認知有如文化文盲，讓他們在找路到畢家途中，吃盡苦頭。由於范達爾自視甚高，根本不屑認識倫敦地理與地名，在第八幕

中，他不知如何在夜裏從他的住處巴克雷斯伯里(Bucklersbury)走到畢沙羅位於高塔街(Tower Street)、在十字架修士(Cruched Friars)附近的家，畢沙羅只得派家僕弗里斯科帶路。草根性強的弗里斯科有仇歐情結，暗中捉弄范達爾，將他留在暗巷自己跑了！丟下范達爾自己在舞臺上上演迷情倫敦的窘態。老外得利昂與阿瓦羅雖然識路，但他們在深夜分別到了畢家後，仍不確定是否抵達正確的住址。阿瓦羅敲門詢問「這是甚麼地方？甚麼街道？這條街叫甚麼名啊？」(9.56)。海翰在門口騙他：「是雷登廳(Leadenhall)」，並問他：「你在途中難道沒看到四噴泉嗎？」(9.57-58)。阿瓦羅對倫敦的無知，讓他以為走錯路而繞到別處。得利昂到畢家後，色慾薰心的敲門，海翰跟他說：「你要找的女人不住在這兒！」得利昂回答：「我可能走錯了，請問先生，這條街叫甚麼來著？希望這是通往十字架修士的路」(9.91-93)。海翰騙他說：「這裏是芬確奇街」。又說：「如果你要到十字架修士的畢家，就得靠你的鼻子了，看看能不能夠嗅出猶太味！」(9.94-95)。²⁰ 沒有方向感（也就是沒有文化確定感）的得利昂因此被支開。

在第九、十幕的戲劇安排裏，霍頓透過得利昂、阿瓦羅與小人物弗里斯科間的「問路」、「找路」、「引路」之特寫，重複呼喚倫敦的地名與路標，來上演迷你規模的城市旅遊，使觀眾不僅能感受到湯瑪斯·海沃德(Thomas Heywood)在《倫敦四學徒》中所說的「你時時刻刻所見的倫敦」(a “London that yee see hourelly,” sig. A4v)，²¹ 還能藉此聞到劇中特殊的倫敦「味」(“smell” of London)，使觀眾對日日所處之平凡巷弄產生高度認同感。第九幕主角是小人物弗里斯科，他拋下范達爾後，在路上與得利昂與阿瓦羅巧遇。老外每次問他方向、街道名，弗里斯科總是用道路的文化指涉，來暗示三人的文化平行，他說：「我在高塔街，你在

20. 倫敦人對於猶太移民的文化刻板印象與歧視，請見 James Shapiro, *Shakespeare and the Jew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與 Jonathan Gil Harris, “Public Enemas: The Disjunctions of the Extremental Jewish Pharmakon,” in *Foreign Bodies and the Body Politic: Discourses of Social Patholog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79-106。

21. 《倫敦四學徒》在一五九〇年代的版本已失傳，故引用一六一五年版本。

雷登廳，另一位在芬確奇」(“I in Tower Street, you in Leadenhall, and the third in Fenchurch Street,” 10.25-26)。這三條路是倫敦三條永不交會的平行大道。走著走著，弗里斯科引述當地的倫敦石傳說與地方小吃，讓整個場景瀰漫著濃厚的倫敦味。弗里斯科對老外說：「我聞到倫敦石了！它的味道就像阿比教堂巷(Abchurch Lane)內、母親牆(Mother's Wall)那邊的餡餅味！先生！感覺一下，我聞到倫敦石的味道了！」(10.41-43)。在深夜，弗里斯科帶著老外走過可以聞到臭味的排水溝(Pissing Conduit)、常春橋(Ivy Bridge)、西敏寺區(Westminster)、再繞到城外肖爾迪奇區(Shoreditch)。這一幕，倫敦的重要巷道與景點不斷被提起與呼喚。作家霍頓透過找路的置入性特寫，來強調倫敦的地方風景，以喚起倫敦人對地名的認知與認同，並呼籲觀眾，身為倫敦人，要認倫敦路。霍頓的重要文化論述，在老外地理文盲與欠缺文化知識的襯托下，顯得格外重要。

這三位老外雖然被耍，經過幾番折騰，最後還是用問路的方式找到了畢家。范達爾到畢家後，三位女士用計聯手把他騙進一個大木桶，把他吊起來，不給他吃東西（第十一幕），情節就像喬叟《磨坊主人的故事》(*The Miller's Tale*)般的荒謬，²² 即使畢沙羅在家，也毫不知情。解決了范達爾後，三英男三英女進場，雙方此起彼落地數落老外，瑪西亞所認同的是英國在政治上的女性政體，她說：「雖然我父親是葡萄牙人，我的母親孕育了我深厚的英國味，所以不可能有低俗、垂涎的法語來讓我自甘墮落」(11.135-36)。三位英國人也同時譴責畢沙羅為富不仁的敲詐勒索、買賣職位與放高利貸的經商模式，因為那樣的經濟行為，與信仰慈善的基督文明截然不同。畢沙羅在家聽到他們的對談，非常憤怒，此時家人的爭論，從語言文化隔閡演變成財產保衛戰的利益衝突，雙方撕破臉，三女兒被趕進屋裏。

夜晚的畢家不得安寧，家中集體的仇外情節又更加強烈，在第十

22. 有關於范達爾被裝到籃子中這個典故，有學者認為霍頓可能不是參考喬叟的作品，而是參考了多伊伯斯(Doesborch)的《維吉里爾斯的一生》(*Lyfe of Virgilius*)，見 Andrew Fleck, “The Origins of *Englishmen for My Money's* ‘*Lover in the Basket*’ Episode in Doesborch’s *Lyfe of Virgilius*,” *Notes & Queries* 57.3(2010):357-59。

一幕，霍頓以氣味／位來突顯文化差異。羅崙西亞在家公開侮辱范德爾，告訴老爸，如果想知道范達爾的下落，用聞的就可以聞到荷蘭人的味（位）置。畢沙羅抬頭嗅嗅、看看，終於發現范德爾被吊在半空中，弗里斯科補上一句倫敦的指標性評論：「老范看起來真像主教門(Bishopsgate)酒館外面的那個標誌，嘴巴開開、臉大大，甚麼都不是！」(11.371-72)。畢沙羅生氣地質問家僕為何沒有帶范達爾回家，弗里斯科在回答主人的問題時，又不斷重複提起倫敦的地名，說他的確有帶范達爾走過巴克雷斯伯里(Bucklersbury)、稻坵街(Cornhill Street)、景隆街(Cannon Street)等地，畢沙羅決定要給弗里斯科吃棍子。

在最後一幕，六位英國人分別用他們的方法，也就是伊麗莎白面對歐洲競合的反制策略，用先發制人、先斬後奏的方式擇其所愛。哈維裝病，告訴畢沙羅，他死之前，要把他所有的土地留給瑪萊娜。愛錢的畢沙羅因此希望瑪萊娜盡快拿到土地，而催促女兒盡快與哈維結婚，因為等到哈維死後，瑪萊娜就可帶著英國人的土地嫁給阿瓦羅(14.90-101)。詭計多端的畢沙羅怕哈維不死，臨時還準備了毒藥要毒死他。哈維當場與瑪萊娜結婚後，馬上說他一點病也沒(14.157-58)，但婚已結，一切都為時已晚，畢沙羅準備好的毒藥毫無用武之地。此時，家僕弗里斯科帶來消息，說羅崙西亞跑了(14.182)。西班牙人巴沙羅(Balsaro)也來報，證實羅崙西亞和海翰已經公開在塔坵完婚(14.193-99)。這時，沃葛雷夫牽著與瑪西亞進場。瑪西亞告訴畢沙羅她懷孕了。畢沙羅哀嚎：「我完了！我是個惡棍、奴才、笑柄！是個被人瞧不起天大笑話！」(14.287-89)。面對英國婚姻中強勢的本位主義，老外畢沙羅只能向三個女兒妥協。霍頓《英國人是我的選擇》中的三個女人，其實就是要藉與老外的聯姻，來回顧英格蘭在面對歐洲競合的最終抉擇，也就是，身為一個被動政體，英國必須要在自家倫敦大膽開啟她的新生命論述。

陸、大時代之小人物

《英國人是我的選擇》中的文化價值衝突，似乎是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每個移民者都會經歷到的人生經驗，但是霍頓在該劇的創舉，是成

功地將阿嘎斯與史鐸對倫敦城市生活的細節與視野立體化、藝術化。從劇中城市空間的創造、英國文化本位主義的提倡、英語地位的提升、地方空間藝術的論述、集體仇外意識的建立、英國人婚姻抉擇中的現實政治、第二代移民的歸化與情感歸屬、乃至於倫敦身為女性主體而受制於文化商業流動的現況，我們可以看到英國國內市井小民生活與文化價值的改變，無一不與歐洲政治文化的脈動息息相關。劇中三位女人的婚姻處境與主張，其實是霍頓對於英國的陰性政體時常受制於歐洲政治競合的一種影射。一五九〇年代，當英國人竭盡全力守護英島、加深英化與創造英國文化新價值的同時，英國人亦知曉開放與經濟文化流動是擋不住的趨勢，所以新城市空間中的主動與被動的開放性，都反映在劇中特殊的景域與音域中。倫敦對愛家愛國的霍頓來說是一個「像巴比倫通天塔」的地方（“Babel-like” place）(Campos 611)，商業喧囂、榮景可期。但倫敦這個地方有的，可不是那種只信仰早期資本主義的那種拜金之城，在這裏，我們可以聽到異邦人與本國人都必需要講的英文、外文；在這裏，還可聞到外國人的味道與英國人最終的心靈歸屬。

徵引文獻

- Abbot, George (1599).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London.
- Act of Supremacy* (1588). *The National Archives*. Crown. Web. 5 March 2014.
- Act of Uniformity* (1559).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Church History*. Ed. Henry Gee, and William John Hardy. New York: Macmillan. 458-67. Hanover Historical Texts Project, July 1999. Web. 16 Feb. 2014.
- Agas, Ralph (1570-1605?). *Civitas Londinium*. London.
- Aldred, Natalie C. J. (2010). “A Critical Edition of William Haughton’s *Englishmen for My Money; Or A Woman Will Have Her Will*.” 2 Vol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Bartolovich, Crystal (2008). "London's the Thing: Alienation, the Market, and *Englishmen for My Money*."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71.1: 137-56.
- Berek, Peter (1998). "The Jew as Renaissance Man." *Renaissance Quarterly* 51.1: 128-62.
- Bicheno, Hugh (2013). *Elizabeth's Sea Dogs: How England's Mariners Became the Scourge of the Sea*. London: Conway.
- Book of Common Prayer* (1559). London: Church of England.
- Brigden, Susan (2001). *New Worlds, Lost Worlds: The Rule of Tudors, 1485-1603*. London: Viking Books.
- Calvin, John (1855). *Commentaries on the Catholic Epistles*. Edinburgh: Calvin Translation Society.
- Camden, William (1586). *Britannia*. London.
- Campos, Edmund Valentine (2002). "Jews, Spaniards, and Portugales: Ambiguous Identities of Portuguese Marranos in Elizabethan England." *ELH* 69.3: 599-616.
- Childs, David (2009). *Tudor Sea Power: The Foundation of Greatness*. Barnsley: Seaforth.
- Cormack, Lesley (1997). *Charting an Empire: Geography at the English Universities, 1580-16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ttret, Bernard (1997). *L'Édit de Nantes 1598: pour en finir avec les guerres de religion*. Paris: Perrin.
- Curtis, Benjamin (2013). *The Habsburg: The History of a Dynasty*. London: Bloomsbury.
- De Vries, Jan (1984). *European Urbanization 1500-1800*. London: Routledge.
- Doran, Susan (1993). *Elizabeth I and Religion 1558-1603*. London: Routledge.
- Duffy Eamon (2014). *Saints, Sacrilege and Sediton: Religion and Conflict in Tudor Reformations*. London: Bloomsbury Continuum.
- Elliott, J. H. (2002).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London: Penguin.
- Fleck, Andrew (2010). "The Origins of *Englishmen for My Money*'s 'Lover in the Basket' Episode in Doesborch's *Lyfe of Virgilius*." *Notes and*

Queries 57.3: 357-59.

- Gadd, Ian, and Alexandra Gillespie (eds.) (2004). *John Stow (1525-1605) and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Past*. London: British Library.
- Gerson, Armand Jacques, Earnest Vancourt Vaughn, and Neva Ruth Deardorff (1912).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Commerce in the Tudor Period: the Organizatio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Muscovy Compan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Gibbons, Brian (1980). *Jacobean City Comedy*. London: Routledge.
- Goubert, Pierre (1991). *The Course of French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Gurr, Andrew (1997). *Playgoing in Shakespeare's Lond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cklyut, Richard (1589).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i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London.
- Harding, Vanessa (2002).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in Paris and Lond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 Jonathan Gil (1998). *Foreign Bodies and the Body Politic: Discourses of Social Patholog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 Jonathan Gil (2004). *Sick Economies: Drama, Mercantilism, and Disease in Shakespeare's Englan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Haynes, Alan (1977). "Italian Immigrants in England, 1550-1603." *History Today* 27: 529-34.
- Hentsch, Thierry (1992). *Imagining the Middle East*. Montréal: Black Rose Books.
- Heywood, Thomas (1592). *The Four Prentices of London*. London.
- Hoenselaars, A. J. (1992a). *Images of Englishmen and Foreigners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 Rutherford: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 Hoenselaars, A. J. (1992b). "Reconstructing Babel in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 William Haughton's *Englishmen for My Money* And John Marston's *Antonio And Mellida*." *Neophilologus* 76.3: 464-79.
- Kermode, Lloyd Edward (2009). *Aliens and Englishness in Elizabethan*

- Dra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nross, Patrick Balfour (1977). *The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 London: Jonathan Cape.
- Knecht, Robert (2002). *The French Religious Wars*. Wellingborough: Osprey Publishing.
- Leggatt, Alexander (1973). *Citizen Comedy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Luu, Lien Bich (2005). *Immigrants and the Industries of London, 1500-1700*. Aldershot: Ashgate.
- Mallett, Michael Edward (2012). *The Italian Wars 1494-1559: War, State,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 Mercator, Gerardus (1569). *Nova et Aucta Orbis Terrae Descriptio ad Usum Navigantium Emendate Accommodata*. Rotterdam.
- Moorhouse, Geoffrey (2009). *Great Harry's Navy: How Henry VIII Gave England Sea Power*. London: Orion.
- Nicholls, Mark (1998). *History of the Modern British Isles, 1529-1603*. Oxford: Blackwell.
- Norden, John (1593). *Speculum Britanniae*. London.
- Ortelius, Abraham (1570).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Antwerp.
- Pendrill, Colin (2002). *Spain 1474-1700: The Triumphs and Tribulations of Empire*. Oxford: Heinemann.
- Rowland, Richard (2010). *Thomas Heywood's Theatre, 1599-1639*. Farnham: Ashgate.
- Saxton, Christopher (1580). *Atlas of the Counties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 Shapiro, James (1996). *Shakespeare and the Jew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herman, William (2002). "Stirrings and Searchings (1500-1720)."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Ed. Peter Hulme, and Tim You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1.
- Starkey, David (2004). *Six Wives: The Queens of Henry VIII*. London: Vintage.
- Starkey, David and Susan Doran (2009). *Henry VIII: Man and Monarch*.

London: British Library.

Stow, John. *Th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 London: 1561, 1598, 1602.

Stow, John. *A Summary of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London: 1565-1610s.

Stow, John. *The Annals of England*. London: 1592-1615.

Stow, John. *A Survey of London*. London: 1598, 1602.

Strong, Roy (1987). *The Cult of Elizabeth: Elizabethan Portraiture and Pageant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Strong, Roy (1999). *Art and Power: Renaissance Festival 1450-1650*. London: Boydell Press.

't Hart, Marjolein (2014). *The Dutch Wars of Independence: Warfare and Commerce in the Netherlands, 1570-1680*. London: Routledge.

Weir, Alison (2014). *The Marriage Game: The Novel of Elizabeth I*. London: Hutchinson.

Whaley, Joachim (2013).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ume 1: Maximilian I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rigley, E. A., and R. S. Schofield (1989).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A Reconstr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